



從任命鄧以明爲總主教事件看

教廷的路線及國人的心理

湯漢

(甲) 任命風波的前後

今年六月六日，教宗乘鄧以明主教應邀出席全球天主教的一項特殊慶典之際，宣佈他爲廣州總主教。

正當報界輿論以爲這項宣佈顯示中國與教廷關係已獲改善之時，上海文匯報却引述「世界月報」(“GLOBE”)說，梵蒂岡透過在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神父、修女和修士，「在與當地人的日常接觸中，經常得到第一手的情報」。該報又指出，天主教情報網比美蘇更有效率。(路透社北京六月九日電)六月十一日的新晚報亦以「情報網遍佈的梵蒂岡」爲題，刊載了這篇千多字的文章。隨即，六月十二日的文匯報及大公報均以頭條新聞，刊登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負責人楊高堅六月十一日在北京發表的抗議聲明，反對教廷任職鄧以明，指教廷此舉無視及粗暴干涉中國教會主權，又說鄧主教申請到香港原係治病探親，他的行動顯示不知自重。中國外交部亦於六月十二日發表聲明，說教廷這項任命「粗暴地干涉了中國教會的自主權利。」(美聯

社北京十二日電) 廣東省及廣州市天主教愛國會亦於六月十二日舉行會議，議決支持楊高堅主教的聲明，強烈抗議教廷干涉中國教會主權，嚴厲譴責鄧主教，說接受委任為背叛人民的行徑(南方日報六月十四、十五日)；又於六月廿二日再召開會議，一致決定撤銷鄧主教的廣州教區主教和廣州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職務。(文匯報六月廿三日)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負責人至六月十七日才發表談話，表示完全支持楊高堅主教的抗議聲明。(人民日報六月十七日) 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在六月十七日召開會議，議決支持楊高堅主教的抗議聲明。(南方日報六月十八日) 最後，於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四日江蘇省天主教愛國會和教務委員會開會，選出南京和蘇州兩位主教時，重覆同樣的抗議。(新華社南京四日電)

至於教廷及鄧主教本人則一直緘口不作答辯。直至六月廿二日返抵香港，鄧主教才於翌日上午十一時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會中發表了以下聲明：「今年聖神降臨期間，剛好羅馬舉行一項特殊慶典，全球各地有五十多位樞機主教及三百多位主教到臨參加，本人亦被邀出席。既然天主教在全世界絕無政治目的，只願鼓勵每個國民愛教愛國，發揚民族美德，所以，教宗為了給予祖國同胞和教會內的全體弟兄姊妹們更大的榮譽及鼓勵，宣佈本人為廣州總主教區的總主教。由於企望這項宣佈有助於促進教廷與祖國的關係，本人勉為其難，接受了這項職銜。」而且在差不多一個小時的記者招待會中，鄧主教從容不迫地詳細答覆了記者們十多個問題。他所着重的只是解釋委任和接受委任的善意，對於指控絕無半句反唇相稽的說話。

綜觀這場暫告一段落的風波，我們可能發出以下的疑問：為什麼教廷偏偏選了這個時刻委任鄧以明為總主教？這項宣佈是不是明智之舉？另一方面，中國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為什麼會抗議？這種反應是否操之過急？最後，為開解這個結，雙方可作什麼？為回答這些問題，筆者以為應從教會觀的新轉變到教廷對中國的一系列歷史性行動說起。

(乙) 從教會觀的新轉變到教廷對中國的一系列歷史性行動

從教父時代起，傳統神學深受羅馬政治體制的影響，強調教會是「制度」或「結構」；也依循希臘文化的發展方向，着重神學「概念」的演繹。這不但使每位現代基督徒難以領悟，也無法配合實際生活的挑戰。

近卅年來神學的轉變因素固多，但存在主義所給與的影響不可謂不重，尤其

猶太神學家馬丁·卜柏 (Martin Buber) 所著的「我與您」(I and Thou) 一書所發射的動力，更使今日的神學移前了一大步。馬氏於該書中指出，人與人之間有兩種關係，即「非位格關係」(Impersonal Relationship) 及「位格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前者把對方視作被我使用之物，爲了被我利用而存在，在意義上被貶稱爲「它」(It)。後者則保留雙方的主體地位，彼此在心靈中將自己交給對方，在意義上尊稱對方爲「您」(Thou)。馬氏認爲天主的啓示屬於後者，天主並非以啓示告訴我們一些純理性的觀念，而是透過啓示接觸我們，與我們產生神人交往的實際作用。

經過馬氏的喚醒，及神學家不斷的反省和提倡，梵二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頒佈的「禮儀憲章」，首先把教會由「制度」這一概念伸展而成「神人交往的過程」。這種位格關係的看法，在今日神學的術語上稱爲「事件」。它反映出天主與天主子民間的互相呼應。正如昔日天主在禮儀中把祂的意旨向以色列民說出來，而以民全體答允接納；同樣，今日教會在聆聽天主聖言，尤其在感恩聖祭中，一起回答天主的呼召，向天主誓忠。這觀念所強調的已不只是「概念」，而是「生活」。繼而，梵二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公佈的「教會憲章」，進一步稱教會爲一個「奧跡」，強調共融與區別應和諧共存。正如在天主聖三內有性體的共融和位格的區別，同樣，在教會內亦保持着普世教會的共融和地方教會的獨特性。由於每一個地方教會是一個完整的生活團體，不是普世教會的不完整部份，故聯合一起時，不但不必犧牲或分解，且彼此尊重，在時代的進步中相輔相成，更有效地履行傳揚福音的使命。

此外，近十多年來，神學除了受到存在主義影響外，還受到俗化運動的感染。談到「俗化」這兩個字的含義，過去和今日所指的已不一樣。過去當我們說某人很俗化時，其意是指他的行爲已不合教會要求，走向罪惡中；今日當我們指某人很俗化時，其意義可能指這位基督徒的宣講和服務能進入及改良世界，促進天國的實現。過去所指的是消極和敗壞的意思；今日所指的可能是積極和優良的意思，它肯定物質世界的價值，也推動基督徒入世的職責。

在這俗化運動的推動下，梵二再進一步使教會的概念由「事件」和「奧跡」擴展成爲「世界的僕人」。所以，梵二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頒佈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指出，世界發展是理所當然的，教會不單要尊重世界的成就，還應視自身爲世界的一份子，透過交談方式互相學習，與普世人類分享和關懷彼此共同的需要和命運。正如基督一生爲他人服務，教會也應爲鄰人服務，並

透過這份愛心的服務見證基督。所以教會應與一切善心人共同努力，為世界尋求真正而持久的和平，消除貧窮的現象和原因，謀求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

上述梵二教會觀的新趨向，不但成了今後整個教會上下的生活指南，也成了教廷目前對祖國推進友好關係的路綫方針。於是，為配合這條路綫，在時機成熟時，教廷對祖國推行了以下一系列的歷史性行動：

(一)教宗於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在夏宮接見朝覲信眾時，公開表示希望羅馬天主教會和中國大陸教會，恢復直接關係。（公教報八月廿四日）

(二)法國馬賽總主教及法國主教團團長艾切卡雷樞機，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於一九八〇年二月廿七日抵達中國，作為期十七天的訪問，他與中共多方面的負責幹部進行了廣泛的會談。三月十四日大公報的報導是：「艾切卡雷主教欣賞中國政府對宗教所採取的現實主義態度，他相信，中國將給予宗教以應有的地位。他認為雙方正以互相信任的精神在友誼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三)奧地利維也納總主教、奧地利主教團團長及梵蒂岡的非信徒秘書處負責人柯尼希樞機，於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到訪中國，為期十天，受到了與法國樞機同等的待遇。三月廿一日大公報報導：他對中國人民懷有十分友好的感情，也滿載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返回奧地利。他此行對中國及中國教會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他認為，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都有共同的願望，那就是為爭取世界和平、正義，為建立美好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四)教宗於今年二月十六日起程來亞洲作牧民探訪。二月十八日在馬尼拉向當地中國教友團體講話時，對中國教會發表了一篇充滿修好善意的演詞。教宗特別指出，「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與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並無矛盾。」他希望過去的成為過去，要注目將來。

(五)今年二月廿八日，教廷國務卿卡薩羅利樞機主教代表教宗來港探訪鄧主教。在同日記者招待會上，當記者問及梵蒂岡是否已積極地謀求與北京恢復聯繫時，樞機主教回答說：「我們一直尋找和中國接觸的方法，也歡迎任何交流的機會。我們盼望能和中國交談，一如我們希望和每個國家交談一樣。」

看了上述教廷對中國推進友好關係的一系列歷史行動後，我們不難明白鄧主教的任命是這一系列行動的一環，有承先啓後的目的。由於教宗希望藉着這位被教廷及中國雙方接受的主教，再進一步加強雙方的關係，故擺正他的職銜，以表示對中國的尊重和敬意。可惜，教廷在宣佈任命之時，沒有把整個動機詳細披露；而中國政府及中國教會也沒有體會這番好意，以致引起很大的誤會。

(丙) 中國抗議反映的歷史背景及心理因素

在這件風波上，我們除了要探究教廷的路綫外，還須從另一方面去瞭解國人的歷史背景及心理因素。

在今次中國全部抗議的聲明中，以外交部及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發言人的談話比較溫和，也最有份量。它們表示支持楊高堅主教的聲明，抗議教廷干涉中國主權。這樣的抗議，與中國近百年歷史及民族自尊心理有着很大關係。

須知，中國自秦、漢以後即已形成大一統的局面，社會組織大多在一種穩定的狀態下發展，少有變革，復因地理的阻隔，甚少與其他國家往還。所以文化上的孤立保守及心理上的自滿自足，乃是中國人傳統的心態現象。

明朝以前，因為西方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組織沒有多大變動，中國尚可相安無事，除了北狄和東夷以外，沒有什麼足以煩心的地方；但明朝以後，由於西方社會跨入了工業革命的領域中，各方面都起了變化，生產和武力都大勝於前，因此農村社會的中國遇上了工業社會的西方，處處顯出遲鈍、保守和失敗，尤其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鎖國局面被迫打開。

本來，中國對於外族文化，一向抱着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意把它們接受和消化。歷史上，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的異族文化是印度佛教，第二次是波斯阿拉伯文化。這些接觸可追溯到漢唐時代；而在接觸的過程中，中國人固然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十分自信和愛護，但對外來文化亦同樣具有寬大和接納的態度。可是，明朝以後由歐洲輸入的西方文化，給中國文化的衝激太大，它的差異完全超出了中國文化的適應極限，因此造成了很多中國人的極大抗拒心理。加上當時西方文化之東來靠着船堅炮利進入中國，使很多中國人生出很大反感。即使今日中國大力提倡四化，對西方文化作極大量的接受，但社會心態仍環繞在歡迎還拒的矛盾之間。這實與民族自尊心理有極大關係。

此外，早期西方傳教士雖曾幫助了中國踏上現代化，比如：介紹新教育科技，改良社會風俗，推行慈善事業，鼓吹政制思想的改革等，但這些傳教士或是坐東印度公司的輪船到來，或是兼做他們政府和商人的繙譯，又或是透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獲得傳教權利，以至傳教士被視作殖民主義者的幫兇，因而在抗拒西方殖民主義的心理下，產生不少教案，形成了國人對基督宗教的惡感。而天主教方面因教會本地化運動推展緩慢，以致不少本地神職人員有被視作二等神職人員

之感。這些歷史及心理陰影至今未消。

所以，爲了避免重蹈覆轍，對今次抗議所應注意的，不單是抗議本身，而且是抗議所反映的歷史背景及心理因素。

由此可見，給教廷出主意的人，以至教廷自身的決定，均忽略顧及國人的歷史背景及心理因素。這次任命的動機雖好，也能彰顯普世教會共融的意義，但宣佈的方式及時間，則顯然未經過深思熟慮。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事。

而鄧主教之接受任命，一方面表現他對普世教會共融觀念的尊重，另一方面亦表示他願意毅然奉獻餘生，爲教爲國，多作貢獻。在他身上唯一可指出的瑕疵，相信就是他的政治嗅覺不夠敏銳。

至論中國天主教會逐步升級的猛烈抨擊，則屬過度敏感和急速。既然今日祖國的政治觀很着重歷史趨勢，則對任命事件的看法又怎能抽離它的整個歷史過程？在判決四人幫惡行前，祖國會依法律程序給予他們自辯機會。但今次，鄧主教在返港前，尚沒有機會自白，便遭譴責，指他背離祖國，並被撤職，受到還不如四人幫的法律照顧。據最近從廣州探親回來的人說，在指控鄧主教前，廣州石室天主堂在主日彌撒時席無虛設；但在指控後，却變得冷冷清清。這種轉變豈不影响政府所提倡的貫徹宗教自由政策的形像？希望有關人士能正視這些得失。

(丁) 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總括說來，這場風波的產生，皆因教廷與中國欠缺溝通和瞭解。爲重新開解這個結，雙方究竟可做什麼呢？以下是筆者個人的一些冒昧建議：

(一)鄧主教在六月二十二日的聲明中，已把這次接受委任的動機說明。未知教廷亦可否在適當時機，表白這項任命的動機？又中國方面在瞭解這番好意後，可否表示前嫌盡釋？

(二)既然中國歡迎外國協助自己推進四個現代化，教廷爲何不可以透過提供這方面的幫助，以促進彼此的溝通？另一方面，中國基督教的弟兄曾多次出來國外探訪交流，天主教方面爲何不急起直追？

(三)這次任命所引起的風波，已顯示教廷當局對國人歷史背景及心理因素瞭解不足。以後遇到同類問題時，未知教廷在這方面能否擴闊諮詢有關人士？另一方面，爲了避免因過度敏感而產生誤會，國人能否在判斷前細心查明事由？

最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可別忘記祈求聖神，在這件修好的工作上多賜助祐。